

## 流变与书写:日本文学对“朱买臣故事”的受容研究<sup>〔\*〕</sup>

○ 王 川

(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摘要〕**奈良、平安时期物语文学是“朱买臣故事”日本受容与改编的萌芽期,室町、江户时代是逐渐向画坛与文坛扩散的兴盛期,明治时代与二宫金次郎“负薪读书”故事的融合是其新生期。本文试以“朱买臣故事”为典型个案,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和变异学研究为理论依据,厘清日本古代文学对“朱买臣故事”受容的历史镜像与流变脉络,析解该故事在日本历史存在和客观实在背景下师承与受容、改编与创新的异质化现象,探究文学质素跨疆域、跨语言、跨文化传播的逻辑规则和内在规律。

**〔关键词〕**朱买臣故事;流变;书写;历史镜像;逻辑理路

### 一、引 言

中日两国间文学关系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文学在流传中的受容与变异研究更是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重要“切片”与“抛物面”。中日两国古代文化交流以中国流向日本的单向度传播方式为主,大和民族汲取中华文化,不断重构日本的文化(文学)镜像,经过汲取→受容→变异的流变过程实现其本土化。中国古代文学长期处于亚洲文化圈的中心地带,“朱买臣故事”是汉文学辐射影响日本文学的题材之一。本文试以“朱买臣故事”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为主题,循本溯源,厘清朱买臣故事在日本流变的历史脉络,尝试运用流变与书写的话语,阐释日本古典文学对该故事的受容,分析文学流变过程中信息失

---

作者简介:王川(1980—),双硕士,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日本文学与文化。

〔\*〕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朱买臣故事’在日本的流变研究”(编号:SK2013B168);安徽农业大学2013年度学科学位点建设项目(编号:XKXWD2013028)的阶段成果。

落、文本误读、形象增删等现象，考量文学间异质性和文学“放送→接收”变异性的内在本质规律，通过中日文学文化关联性研究，加强异文化间互读互解、视界融合，避免文化意识误读和民族心理冲突，进一步推动海外汉学及域外汉籍研究的发展。

## 二、“朱买臣故事”的历史镜像及东渐日本

《汉书·朱买臣传》记述了汉代吴越名臣朱买臣的生平镜像和精神境况，其生命历程经历了家贫、负薪苦读、妻耻之与买臣离婚；出仕，拜为中大夫，后任会稽太守；还乡，遇前妻并舍恩，妻羞愧自缢而死，买臣厚葬前妻；亡故，数年，告张汤，被诛杀，其子山拊官至郡守。“朱买臣故事”作为先贤圣哲成功范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告诫后人要勤勉读书才能出仕为官。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朱买臣故事”历经数百次转载与改编。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中记载：“朱买臣为会稽太守，怀章绶还至舍亭”，记述了朱买臣的逸闻趣事。南北朝时期《颜氏家训》：“上书陈事，起自战国，逮于两汉，风流弥广……或无丝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为时所纳，初获不费之赏，终陷不测之诛，则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之类甚众”，记录朱买臣进谏而最终遭到诛杀的故事。《全唐五代词》卷六：“平旦寅，少年勤学莫辞贫。君不见朱买臣未得贵，犹自行歌背负薪”一文以及唐代徐坚《初学记》卷二天下部“有喜邹子曰：朱买臣孜孜修学，不觉雨之流粟”一文，讲述了朱买臣勤奋读书，孜孜修学的故事。在宋代《资治通鉴》、《太平御览》、《乐府诗集》、《全宋词》等文献中共记录朱买臣其人其事近百次，“朱买臣故事”已家喻户晓。随着元曲、明清小说的兴盛，“朱买臣故事”被大量改编，元代《朱太守风雪渔樵记》、《琵琶记》、《朱买臣休妻》、《会稽山买臣负薪》、《渔樵记》等戏曲，以改编“朱买臣故事”著称。明代陆楫《古今说海》（说略部·谈藪杂记十六）中有“严州寿昌县道旁有朱买臣庙貌，其地有朱池、朱村，居人多朱姓。朱谦之诗云：贫贱难堪俗眼低，区区何事便云泥。会稽乞得无他念，只为归来诧故妻”等记载，考证了朱买臣的生平祖籍。清代袁枚在《小仓山房诗集》卷十四中有“朱买臣采薪歌罢雪花飘，五十登朝气转豪”等诗句，清代文献中记载“朱买臣故事”亦达百余次。在流变过程中人们撷取其中的片段以成语典故、诗词文集、戏曲小说等形式流传下来，如“负薪读书”、“买妻耻醮”、“衣锦还乡”、“马前泼水”等。但不管是成语典故还是戏曲小说的注解中都无一例外出自《汉书·朱买臣传》。

地缘、学缘因素使得亚洲文化圈内各国文化交流呈现以中国强势话语为主，中国、朝鲜、日本等多元文化并存局面，中国文学文化从朝鲜半岛经陆路或从闽浙一带经海路传入日本，给日本的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带来巨大变化。隋唐时期，大批“遣隋使”、“遣唐使”来到中国，他们归国后把当时隋、唐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带回日本，掀起日本国内学习汉文化的热潮，推动汉文学在日本传播，有力推进奈良、平安时代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

圣武神龟 5 年(728)年,以《汉书》等为依据,大学寮文章博士和文章先生集体编写了古代日本第一部中国通史《纪传道》。735 年,在唐留学 17 年之久的吉备真备踏上归途,把大量经史书籍带到日本。吉备真备受到圣武天皇与光明皇后的宠爱,官至右大臣,在宫中教读《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等。757 年,孝谦天皇下令研究《史记》、《汉书》和《后汉书》,日本正仓院也曾派人抄写《汉书》等中国的经史典籍。<sup>[1]</sup>日本现存最古汉诗集《怀风藻》中以《悲不遇》为题记载:“学類東方朔。年餘朱買臣”,诗文中“东方朔”、“朱买臣”等语词映射了“朱买臣故事”等典故已被介绍到日本,并在日本贵族阶层悄然传播这一事实。平安时代,《源氏物语》、《枕草子》、《平家物语》等众多文学作品中陆续出现引用“朱买臣故事”这一典故的章节。另外,该故事以“买妻耻醮”为题收录于《蒙求》,《蒙求》一书的东渐更加推进该故事在日本的广为传播。成书于 12 世纪末至 13 世纪初,以取舍、凝聚、整合、再创作中国古代故事而著成的短篇故事集《唐物语》更加详细地记载且仿作了“朱买臣故事”。室町时代“朱买臣故事”扩散至画坛,其画题在东京狩野派画家中流行,留下蔚为壮观的“朱买臣负薪读书图”系列画作。明治时代,文化师承的历史情境与日本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结合,二宫金次郎“负薪读书”形象出现,是“朱买臣故事”的现实化创造,使朱买臣形象具有了“现实感”和“时代感”,标志着“朱买臣故事”的他国化实现。时至今日,“负薪读书”的故事仍然被引入日本国语教材,在异国他乡的东瀛继续成长。

### 三、日本文学对“朱买臣故事”受容的逻辑理路

据现有资料考证,“朱买臣故事”最早出现于汉诗集《怀风藻》中:“賢者悽年暮,明君冀日新。周日載逸老,殷夢得伊人。博學非同翼,相忘不異鱗。南冠勞楚奏,北節倦胡塵。學類東方朔,年餘朱買臣。二毛雖已富,萬卷徒然貧。”<sup>[2]</sup>

《怀风藻》作者藤原宇合,成书于天平胜宝三年(751 年),共收录 120 首汉诗,为现存日本最古汉诗集,也是我国域外现存最古汉诗选集。717 年,藤原宇合作为第九次遣唐使与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等一起来到中国长安留学,回国后被任命为安房国、上総、下総等广东诸国按察使,732 年因“长屋王之乱”被贬九州,此时藤原宇合已年逾四十,“学类东方朔,年余朱买臣”,深感不受重用,写下了这首《悲不遇》,暗喻自己屈居微贱、怀才不遇。

平安时代(794 - 1194)日本政治上从律令制向摄关政治转变,文化上由以汉诗文为主的“汉风”创作向以假名文学为主的“和风”转型。平安时代是汉唐文学的咀嚼期,明经道、明法道、书道等相继在大学科目中设置,其中设有专门从事《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汉文典籍研究的纪传道。学制完备、汉学勃兴,追六朝遗风、慕初唐四杰、兴元白崇拜,因此平安时代汉文化圈,《汉书·朱买臣传》是人尽皆知,把“朱买臣故事”运用在写歌作诗当中也不难想象。

平安朝初期,描写贵族阶级生活情感的文学得到较大发展,假名文学出现,宫中女流日记文学盛行,开创物语文学这一崭新体裁,《伊势物语》是这一时期

的代表作品，其第六十段《五月まつ》中记录了这样一段爱情故事：因丈夫公务繁忙而无暇顾及家中的妻子，其妻耐不住寂寞跟另外一个男人私奔。后来丈夫作为宇治八幡宫的使者到地方赴任时，看到了和自己的妻子长得很相像的女子，于是作和歌“さつき待つ花橘の香をかげば 昔の人の袖の香ぞする”<sup>[3]</sup>（试译：初闻橘花芬芳气，追忆伊人怀袖香），当妻子听到和歌并认出眼前的人就是其前夫时，顿觉羞愧难当，便入寺削发为尼。作为封建制度下“被妻离婚”的典型，《伊势物语》第六十段与《汉书·朱买臣传》这两则故事受到中日两国文学界研究学者的青睐。日本学者系井久的“《伊势物语》六十段与《汉书·朱买臣传》”一文认为：《伊势物语》第六十段故事是把《汉书·朱买臣传》以“前妻与朱（买臣）的贫穷生活→前妻主动抛弃丈夫并离婚→与新夫再婚→与成为高官的朱（买臣）再会→自缢而死”为故事情节并物语化创作而成。<sup>[4]</sup>

《枕草子》同《源氏物语》被称为日本古典文学的“双壁”，《枕草子》第一百五十四段《故殿の御服の頃》（故殿的避忌日子）记载：

…内裏の御物忌なる日、右近将監みつなにとかやいふ者して、畳紙に書いて、おこせたるを見れば、「参ぜむとするを。今日・明日の御物忌にてなむ。『三十の期に及ばず』は、いかが」と言ひたれば、返りごとに、「その期は過ぎ給ひにたらむ。朱買臣が、妻を訓へけむ歳にはしも」と…<sup>[5]</sup>  
（试译：宫中避忌那天，源中将差一位名叫右近将监光的使者送信，写到：“原本想进去，而今明天是宫中避忌的日子，但‘未到三十岁’怎么样？我回信到：你的三十岁恐怕早已过了吧，你现在离朱买臣教训妻子的年龄应该不太远了。”）

文中作者清少纳言引用《汉书·朱买臣传》中的“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贵报女功’”的故事，回应源中将的“颜回周贤者，未见三十期”。

《伊势物语》和《枕草子》对朱买臣故事的摄取，让我们看到了“汉典和用”与“和制汉典”的影像，虽无从考证二者创作同《汉书·朱买臣传》间存在直接影响与被影响线性关系，但他们在汉籍和汉文化的间接影响下创作完成是学界共识。由此分析，自《伊势物语》、《枕草子》始，日本文学对“朱买臣故事”的受容已经由对朱买臣大器晚成、怀才不遇、隐逸休闲的个体生命历程、自我发展、意义实现向关注朱买臣婚姻过程、婚变情节层面转移。

成书于1018年的《和汉朗咏集》（卷上落叶）中同样记载了“朱买臣故事”的诗句：“樵蘇往反，杖穿朱買臣之衣。隱逸優遊，履踏葛稚仙之葉。<sup>[6]</sup>从诗中“樵蘇”、“隱逸”、“優遊”等语词来看，本诗引用朱买臣的典故意在说明闲情野鹤的隐逸之情，观照摄关政治时期国风文化影响，乡间野佬、闲云野鹤般的隐逸休闲趣旨层面背后依然是屈居微贱的落寞、寂寥与自嘲。

日本第一部“军记物语”《平家物语》记述了1183年篠原之战，战前大臣殿对平实盛说“故郷には錦を着て帰れ（请一定要凯旋归来）”，<sup>[7]</sup>引用了《汉书·

朱买臣传》中“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繡夜行”，表达了平实盛对此次出征的愿望。

《唐物语》第十九段以“朱買臣を捨てたる妻、後に悔みて死ぬる語”（抛弃朱买臣的妻子，之后又后悔之事）为题，叙述改编了“朱买臣故事”，文章以朱买臣之妻为主人公，基于女性意识，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方面进行了改编增删、阐释填补，关注集聚点由婚姻择弃向伦理教育、价值评判转移。

纵观奈良、平安时代日本文学中有关“朱买臣故事”的叙述和受容可以看出，“朱买臣故事”已经被谙熟汉文的贵族阶层学者所熟知，他们在作品创作中从生命历程与自我实现，家庭镜像与婚姻危机，行为选择与伦理教育等方面广视角、多维度、深层次进行文本阐释，体现出一种“滤选式摄取”的特征，这些重新创作或被改编过的“朱买臣故事”又在不断地丰富着当时的文坛，成为文人间广泛交流的话题之一。

日本室町时代以后的四百余年历史，幕府逞强、武士征伐、平安文化衰颓、贵族文化衰落。入日宋僧、入日元僧同入宋僧、入元僧一起成为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主体。入宋僧、入元僧他们游历中国名胜古迹，学习禅宗和汉学，归国时把大量汉籍和佛教经典带回日本，推动善文礼佛的禅宗文学兴起，这种不同于既往佛教的教义迎合了新兴武士阶层的 spiritual 需求，得到镰仓幕府的保护和支持。13世纪镰仓幕府以中国“五山十刹”为模板，在其政治统治中心镰仓设立“日本五山十刹”，其中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五寺为“镰仓五山”。室町幕府足利义满将军于14世纪中期在其政治中心地京都设立南禅寺、天龙寺、建仁寺、万寿寺、东福寺为“京都五山”。“汉文学由远离政坛的以五山为中心的禅林一脉单传，其特点是‘大陆文化的直接移入，吸收的是宋元文学，咀嚼的是程朱理学’”。<sup>[8]</sup>在禅宗影响下，日本汉文学得到又一次大发展，伴随禅文化和汉文学的发展，绘画、建筑、茶道、花道等相继产生并广泛传播。

狩野画派是日本15-19世纪间著名宗族画派，画风题材和着墨技法源于中国传统，狩野正信和狩野元信父子是“大和化”中国画风奠基人，自其始，中日折中合璧的“和式汉画”兴起。收藏在妙心寺大心院由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编撰的《室町时代的狩野派》一书中，有一组关于“中国故事人物图”的绘画，分别以“东坡笠”、“昭君弹琵琶”和“朱买臣”为画题名。据岩井茂树在《二宫金次郎“负薪读书图”源流考》一文中统计，在室町、江户的狩野画坛以及五山画僧中，以“朱买臣故事”为主题的画作达15次之多，可以说临摹朱买臣图成为当时狩野派弟子们的必修功课之一。如狩野派之祖狩野元信的“朱买臣图”（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狩野永敬的“朱买臣图”、狩野等春笔的“朱买臣图”、狩野探幽笔的“朱买臣图”，此外还有大冈春卜、大冈道信、关等元、高田敬辅、锹形斋等人的“朱买臣图”，“朱买臣故事”这一画题在日本室町、江户画坛的盛行由此可见一斑。

狩野派的画师们分别撷取“朱买臣故事”中的“今已四十余矣”的老人像、“家贫，好读书”、“担束薪，形且诵读”等为主题内容，以或坐或卧，或行或立等姿

态为描写形态,构成“置薪读书”型和“负薪读书”型两种。岩井茂树认为:“负薪读书”型是把《汉书·朱买臣传》以来的中国系列说话故事绘画化而形成,“置薪读书”型则是以《唐物语》中朱买臣故事为基础形成的绘画。以“朱买臣故事”为画题,勾勒了一幅幅鲜活的朱买臣像,画中人物栩栩如生、形态各异。其中在狩野正信的“朱买臣图”中上方有一首题诗为:

坐则读书行採薪,拍肩野老与山人。

君恩一旦会稽守,雨笠烟蓑锦绣春。

——横川景三

这是五山文学后期代表人物横川景三为此画所题汉诗。在五山汉文学兴盛的室町时代,中国的历史故事、历史人物等都成为学习和研究的热门,诗中“坐则读书行採薪”、“君恩”、“会稽守”、“锦绣春”等词体现五山诗僧横川景三汉文学素养的同时,也足以可见这一时期“朱买臣故事”在日本的受容。相比较奈良、平安时代在日本文学作品中的受容而言,这一时期其受容的形式更为直接,其内容也更为细致。横川景三这首诗是“朱买臣故事”中朱买臣为官前的整个故事情节的完美缩略,已经不再局限于对“朱买臣故事”某一片段、某一章节的受容。

宋末元初传入日本的《三字经》,虽历经多人注释,形成各种版本,但文中“如负薪”部分都不约而同地注释为“引用《汉书·朱买臣传》”中的故事。明代张瑞图校阅的《日记故事》也传到日本,成为江户时代日本广泛诵读的汉籍之一,其卷二《学知类》中记载“前汉朱买臣字翁子吴人家贫卖薪自给行歌诵书”等内容。同时代传入日本的延宝二年(1674)刊本《君臣故事》卷二以“买臣担薪”为题也刊载了与《日记故事》相同的内容。

随着日本近世俳谐、川柳的发展,“朱买臣故事”也进入俳谐、川柳的视界,贞门俳谐的始祖松永贞德(1571-1653)的“柴かる山で文をこそ見れ、学びにも情を入たる朱買臣”一文,<sup>[9]</sup>另外江户时期著名的川柳集《柳多留》中也有多处运用“朱买臣故事”而创作的,如“朱買臣ちよつちよつとひとつにつきあたり”、“朱買臣呼れて本を懐中し”等。

广泛受到日本人喜爱的《蒙求》中以“买妻耻醮”为题对“朱买臣故事”进行介绍,《蒙求》中记载“朱买臣家贫,常刈薪樵,卖以给事,行且诵书”,对比“朱买臣故事”原典的《汉书》一文中“担束薪,行且诵书”中的“担束薪”,可知《蒙求》中关于朱买臣担薪的方式与《汉书·朱买臣传》无异,都是“负薪行且诵书”的姿态。而源光行(1163-1244)所著的句题和歌集《蒙求和歌》中以“买妻耻醮”为题记载“朱買臣、もとは会稽の人なり、家貧しくて、文道を好みしなむ事、怠る時なし、其隙には薪を樵りてぞ世を渡りける”<sup>[10]</sup>的内容,由此可见,《唐物语》与《蒙求和歌》中关于“读书间隙采薪”为一致。所以“朱买臣故事”在日流变有两种实现路径:一种是“汉文典籍”的直接受容,即“汉籍”;另一种则是“日本化”了的间接受容,即“和书”。因此,在狩野画派中流传的“朱买臣图”的两种类

型“负薪读书”型和“置薪读书”型分别来源于“汉籍”与“和书”也就不难理解了。但不管是“汉籍”还是“和书”，两种形式都不同程度地推动“朱买臣故事”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并受到京都、江户狩野派的吸收和受容，以绘画形式得到更为艺术化形式的传承和受容。

时空转换，文化迁徙转移膨胀，这一时期，朱买臣故事在日本的流变已不是僵硬的教条和各取所需的“片段截取”，而是积极的“符号创造”，绘画、诗歌等被日本人用作创造性表达的载体，这一阶段文化受容已不是消极的、无辨别的、仅依靠嗅觉的文化消费，而是积极的价值认同和创造性文化消费，体现着“沉积式摄取”与积极消纳转化的特征，表征着日本文学对朱买臣故事的受容呈现一种认同和一种“空间与形式”的自我创造。

江户末期至明治初年，汉学衰微，西学日昌，汉文学在此时期攀上高峰又速跌谷底，仿作与翻案、模拟与创造，补阙、促进日化汉文学发展，虽本质上是日本文学，但仿作、续作中国历史素材，无疑具有中国文化的基因与血脉。朱买臣故事的流变体现为与二宫金次郎“负薪读书”故事的融合。

二宫金次郎(1787 - 1856)，幼名尊德，生于相模国上郡栢山村(今神奈川県)，农政家、思想家，著有《报德记》、《报德外记》等。其幼家贫，靠砍柴和编草鞋为生，成年出仕后受到小田原藩重用，在其领地大兴水利，改良农村，推行“报德仕法”，实行农村复兴运动，成为江户重要幕臣。明治24年(1891)博文馆出版了“少年文学丛书”，幸田露伴编撰的《二宫尊德翁》收入其中，该书配有小林永兴执笔绘制的一幅二宫尊德“负薪读书图”。从画中“负薪”、“步行于山中”、“边行边读书”等众多元素来看，不得不使人想起在室町、江户时代盛行的狩野画派的“朱买臣图”。但二者有何关联，是否存在直接影响等这一点，还要从故事作者幸田露伴和插图作者小林永兴说起。幸田露伴(1867 - 1947)，明治时期小说家，自幼受到中日古典文学熏陶，汉学功底深厚。“左国史汉”(即：《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和《汉书》)等是提升汉文学素养的必读书目，明治时期出版的《学生之铭》中以“朱买臣路上的勉学”记载了“朱买臣故事”，由此可知，精通汉籍的幸田露伴对《汉书》故事应当是相当熟知。另外，插画作者小林永兴是中桥狩野画派小林永濯的弟子，作为狩野派的弟子谙熟其师辈流传下来的“朱买臣图”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由精通汉籍的幸田露伴和狩野派弟子小林永兴共同创作出二宫金次郎“负薪读书图”自然是合情合理。

明治35年编写颁布的“文部省唱歌”《幼年唱歌》歌词中收录了二宫金次郎的故事：“朝に起きて、山に柴刈り、草鞋作りて、夜は更くるまで、路ゆく暇も、書を放たず、あはれ、いおらし、この子、誰が子ぞ…”，这首由桑田春风作词，田村虎藏作曲的《二宫尊德》刻画了二宫金次郎“家庭贫困→负薪读书→不断努力→社会成功”的人生经历，给明治时期那些精通汉学的文学家以启发。

察始量终，辨同析异，“朱买臣故事”与“二宫金次郎故事”二者在很多方面存在很大的相似性。首先家贫，二者虽然所处年代相距甚远，但其人生前半期都

处于“家贫”窘境，朱买臣是四十余岁时依然困顿，二宫金次郎出生时虽然家境富裕，但14岁时父亲病故，家境骤变；其次，贫穷时得以维持生计的工作都是“砍柴”，朱买臣是“常刈薪樵”，二宫金次郎是“白天砍柴，晚上织草鞋”；最后二者都“出仕”成功，朱买臣被委以“会稽守”，二宫金次郎受到幕府重用，成为幕府直属官员。两者都被作为“面向儿童的理论教科书”、“励志故事”、“作为勤奋刻苦的象征，激励刚刚踏上明治新社会日本国民”的成功典范等受到幕府教育界的推崇。

另外，无论是在汉籍中的朱买臣形象，还是狩野画派中的朱买臣形象，无一例外都是以四五十岁的“老者”形象出现，这是对《汉书·朱买臣传》史实内容的尊重，也是明治初期以前“朱买臣故事”在日本文学文化中传播的真实写照。但到了明治时代，二宫金次郎“负薪读书图”的人物像则改为“少年像”，与朱买臣“老者”形象反差很大。在人物年龄和形象上的差别可以说是“朱买臣故事”受容的一大转变，这既是当时编撰“少年文学丛书”的需要，也是幸田露伴在写《二宫尊德翁》故事时对二宫金次郎尊敬之意的表达。另一方面，在人物站立的姿态方面，舍弃了“置薪读书型”而采用“负薪读书型”，在树林中边走边读勤奋刻苦的二宫金次郎形象跃然纸上。二宫金次郎“负薪读书图”正是小林永兴对狩野派的“朱买臣图”受容改编的结果，更是中华文化影响同大和民族文化传统、明治维新时代精神的一般环境，适逢二宫金次郎偶发事件个别动因的融合，也就是说，二宫金次郎“负薪读书”故事和“负薪读书图”是“朱买臣故事”在日本文学文化的长河中历经中日两国文化碰撞、交流、融合、承传与变异、改编和创新的体现与表征。

#### 四、“朱买臣故事”日本化的实现

朱买臣故事日本化的实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影响同日本文化发展相融合的动力构成要素，它是外生性动力机制、内生性动力机制同“扰动性”动力机制联动形塑的结果。

朱买臣故事日本化实现的外生性动力机制是日本社会历史变迁的宏观过程和实践需要。日本社会形态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由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变迁，具有从“和汉融合”到“和洋融合”转型的突出特征。公元645年，孝德天皇行大化革新，效中国隋唐建中央集权皇权制国家，伴随“和汉融合”，朱买臣故事流入日本。但向中国的学习不是全盘化，而是择己所需、择己所利的选择性摄取，例如弃中国科举取士和官宦制度，继续承袭世袭制和身份制。朱买臣故事在中国历史长河流变过程中，基于政治风险甚至生命风险，只为历史人物立传，而无官德情感说教和功过是非评判，而君臣关系、平定边疆、政治建言、因言获罪等政治镜像或者政治事件与日本社会主体性不一致逐渐被删减。明治以降，工业文明出现，撕裂扯断了东西方社会物理空间的自我封闭性，“稳定”、“和谐”的历史存在被“革新”、“斗争”的现实空间颠覆，朱买臣故事必然逻辑地走上新阶段，



按新的价值文化确认道德原则的合理性。

朱买臣故事日本化实现的内生性动力机制是文学经验、文学规则的融合融通、继生共生。朱买臣故事的他国化是日本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朱买臣故事在日流变过程中本土文学经验、文学规则以及文学思潮的嬗变是朱买臣形象变迁的内在动力机制。平安时代女流文学、物语文学以及镰仓、江户时期军纪物语、俳谐的出现,文学审美意识和物语文学等文学风格的变化,都给“朱买臣故事”在日本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平安末期的日本文坛开始由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物哀”文学向以《古今和歌集》为代表的幽玄、有心以及以《新古今和歌集》为代表的余情余韵、“なさけ(情)”、抒情性等的转变进一步促进朱买臣形象在日本的转变。室町、江户时代以“无心”、“闲寂枯淡”等为代表的文艺理念的变化使得“朱买臣故事”在日本文学流传中呈现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等特性。一定时期内文学传统、民族欣赏习惯等思想内核,推碾着文学规则的汇通性整合。

日本社会文化的“独特性主体存在”是朱买臣故事日本化实现的重要力量源泉,作为“扰动性”因素,它发挥着“形塑”机制的作用。中国古代长期处于封建儒家文化熏陶之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君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在文学创作或者改编的过程中,难以突破社会桎梏,因此,“朱买臣故事”在中国文学中成了“孜孜修学”、“勤奋读书”的代表,如《三字经》中“头悬梁,锥刺股,如囊萤,如映雪,如负薪,如挂角”,而朱买臣之妻则成了封建礼教的践踏者,受到后世人们的指责,最终落得貽笑千古的骂名。唐代的李涵把“朱买臣故事”以“买妻耻醮”(醮即“改嫁”之意)为题编入《蒙求》这一启蒙教材,以警示后人,明代陈全之在《蓬窗日录》卷七中写到“采薪行道自歌呼,越俗安知有丈夫。一见印章惊欲倒,相看方悔太模糊。”《四库全书》集部有云“死亭湾在阆门外七里,汉朱买臣妻既弃其夫,而再嫁后见买臣贵,耻而自缢,故名此处”并有诗云“不废行吟复负薪,可憐愚妇苦嫌贫。谁知驷马重来日,便是当年朱买臣。”更有明代《鸳渚志徐雪窗谈异》卷上“羞墓亭记”中诗言:“朱买臣,朱买臣,行歌负担妻子嗔。恩情难系薄劣妇,一旦捐弃如轻尘。鸳鸯分翼比目破,孤灯举眼无相亲。贫富于世果炎热,结发尚尔况路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方孝孺在《买臣妻墓》中云“青草池边一故丘,千年埋骨不埋羞。丁宁嘱咐人间妇,自古糟糠合到头。”前妻离开朱买臣之后,再嫁他人妇,这在“贞女不事二夫”的传统儒家社会背景下,违背“三纲五常”之道德礼教,是社会唾弃的对象。

与《汉书·朱买臣传》在中国的流变不同的是在日本文学中形成了基于女性为主体,从伦理教育、文化审美层面,对“朱买臣故事”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文学体裁等方面进行信息内容的增删与解读、增补与阐释、创造与重新书写。中日两国婚姻制度形态差异性存在,中国传统社会男娶女嫁,婚后生活在夫家,而日本平安时代虽然已进入父系社会,但普遍实行招婿婚(访妻婚,也即女性是婚姻主体,婚后依然住在娘家,所生子女随母亲居住),这种婚姻形式使得女性在

婚姻中具有较大的婚姻自主权和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在婚变这个情节日本文学对“朱买臣故事”的受容与中国文学显示出很大的差异。

中国古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处于强势话语地位,以致周边国家文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sup>[11]</sup>如朝鲜文学、日本文学、安南文学等。“朱买臣故事”东渐日本后,受到日本文化背景、文学传统的影响,在接受主体间产生信息的增删、文学形象的变异,逐渐形成他国化的“朱买臣故事”。在“朱买臣故事”日本化的过程中,为进一步适应日本文学文化的发展,摈弃原著《汉书·朱买臣传》中儒家社会的封建道德思想观念,增添更具文学、艺术气息的符号,重新改造并加以解读利用,最终实现“朱买臣故事”的日本本土化。因此,我们可以说,“朱买臣故事”是汉文典籍在中日文化交流、文学传承过程中,日本社会变迁的宏观历史外在推动力,文学经验、文学规则融通的内在动力机制以及文化个性主体形态因素有机融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结果。

## 五、结 语

“朱买臣故事”在日本的传播是以《汉书》为载体,以遣隋使、遣唐使为担当者,最先在日本贵族阶层传播,并逐渐在日本文学文化中兴盛起来。经奈良、平安时期汉诗、物语文学对朱买臣故事的受容,逐渐在日本生根发芽,到室町、江户时代影响遍及狩野画坛及文学领域,迎来了“朱买臣故事”东渐的兴盛期,明治时期通过与二宫金次郎故事的融合,“朱买臣故事”得到重新书写。它的传播特点是时代久远、层面广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从最早的汉诗、物语文学、女流日记文学、军记物语,到室町江户时代的禅宗画坛、禅林文学,再到江户时代的俳谐、川柳等日本文学不同体裁中均有涉猎。

朱买臣故事在日本文学中的流变,体现了文学影响的同一性与变异性共存的辩证关系。社会心理、文化基因、价值取向、历史语境等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差异特殊性,致使同一素材、同一主题在输出者与接受者间非“二元直线”传播。“他者的形象在被塑造的时候,总是掺杂进了注视着本身的文化模式,被塑造出来的他者形象总是或多或少的带有注视着的主观意识想象”,<sup>[12]</sup>我们不能忽视经济权力和文化习惯的控制力,观照更广泛的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可知,接受主体的客观存在状态、包括主体需要等规定性,必然影响对同源性素材的选择增删、过滤移植、借鉴改造,接受者从自身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介入文学接受,致使主体思想、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艺术形式发生变异,补进融合大和文化的民族气质、集体情愫和文化因子,体现着外来影响与原发内生、他国化与本土化的双重特质,也正是因此,同一素材的朱买臣故事才能够在汉语与日语两种语言、中华文化和大和文化两种文化系统中随着观念的嬗变和历史的变迁而持续流传。

朱买臣故事在日本文学史的嬗变过程,表征着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轨迹与程度。推古朝时期日本开始出现用汉字或者汉文创作的文学作品,日本

汉文学肇始。乃至平安时代日本受容中国文学形成第一次高潮,推动日本汉文学的昌盛,“出于对先进文化的崇拜,追逐新倾向,模仿拟作”<sup>[13]</sup>的特征,朱买臣故事在贵族阶层广泛传播。镰仓时代,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由贵族小众向市井大众扩散,宋元文化再度影响五山文学,日本汉文化形成了第二次高潮,朱买臣故事也扩散到军记物语、川柳、绘画等文学体裁或艺术形式。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西化”,成为东洋文化与西洋文化交融的前沿阵地和矛盾冲突漩涡,中国文化影响力逆转式微,但“当下我们日本人几乎对全部的欧美文化兼收并蓄,似乎被同化了,然而血脉深处中国趣味的东西,仍是使人吃惊的根深蒂固”,<sup>[14]</sup>朱买臣形象与二宫金次郎事件交融、融合,创造新质,在时代变迁的时间落差和空域转换的空间错位中,文化接受者内在图式取舍建构,实现了意义的再生与重铸,体现了文学流变的多维社会空间,表征着不同文化文学间不是“排斥抵制与冲突”,而是“竞争包容与融合”,体现了多元文化在竞争中发展,在发展中并存的基本规律。

中日两国历史存在与客观实在的不同造成“朱买臣故事”在日本流传、受容过程中必然出现信息失落、增添与误读,但内涵中国元素的“前知识”不应被遮蔽与淡忘。时至今日,“朱买臣故事”还在日本广为流传,在日本国语教科书中依然收录“朱买臣故事”,但仔细分析可知“朱买臣故事”的“被妻离婚”、“马前泼水”等内容似乎在日本已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其个中原委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去考证。因此,研究不同文学文化间的关系可以促进文化间的互读互解、避免文化与意识的误读,加强异文化之间的视界融合,避免民族心理与民众情绪之间的冲突。

### 注释:

[1]王勇、大庭脩:《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2][日]小島宪之校注:《怀风藻》,收录于《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9),岩波书店,1964年。

[3][日]渡边实校注:《伊势物语》,新潮社,1976年。

[4][日]系井久:《伊势物语》六十段与《汉书》朱买臣传,《日本文学誌要》第69号,法政大学国文学会,2004年。

[5][日]池注弘务:《枕草子読み・語り》第四卷一百五十四段,http://p. booklog. jp/book/66618. 2013。

[6][日]川口久雄、志田延义:《和汉朗咏集》,收录于《日本古典文学大系》(73),岩波书店,1965年。

[7][日]梶原正昭、山下宏明校注:《平家物语》,“实盛最后”,岩波文库,1999年。

[8]王晓平:《亚洲汉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页。

[9][日]《贞门俳谐集》收录于《日本派文学大系》,集英社,2009年,第133页。

[10][日]新编国歌大观編集委员会编:《新编国歌大观》(第10卷),角川书店,1992年,第936页。

[11][12]曹顺庆:《比较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7、119页。

[13][日]神田喜一郎:《日本的汉文学》,岩波书店,1959年,第3页。

[14][日]谷崎润一郎:《谷崎润一郎全集》(第21卷),中央公论社,1975年,第121页。

[责任编辑:弘 亭]